

## 蔣經國先生與冷戰前期的中美關係

張 力

### 一、前 言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晚間十一時左右，美國駐中華民國大使安克志 (Leonard Unger) 正在參加美國在臺工商會舉辦的年終舞會，突然接獲華盛頓的訓示，告知美國總統卡特 (Jimmy Carter) 預定在華盛頓時間十五日晚間九時（臺北時間十六日上午九時），宣讀美國與中共將於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建立外交關係的「聯合公報」，並指示他在正式發表時間的前兩個小時，將此消息告知中華民國蔣經國總統。安克志大使感覺華盛頓之「做法非常馬虎、非常危險，說不定會引起連鎖反應」。當即向國務卿范錫 (Cyrus Vance) 表示，他要儘快向蔣經國總統報告。范錫未置可否，雖表示「要等到規定的時間才好」，然而安克志仍決定立即晉見蔣總統。（註一）安克志隨即與蔣之秘書兼譯員、新聞局副局長宋楚瑜聯絡，請他立刻安排晉見。此時已過午夜，蔣總統早已就寢，宋楚瑜當即陪同安克志驅車直奔七海官邸。此刻為臺北時間十六日凌晨二時三十分。（註二）自民國十七年美國承認中國國民黨領導

的中華民國，竟在卡特總統時代，結束了長達半個世紀的兩國正式邦交。迎受打擊的蔣經國總統，隨即採取了多項措施，力圖穩定局面。

蔣經國生於一九一〇年，逝於一九八八年。他在四十三歲以前，未曾出訪過美國，也少與美國人士進行正式外交上的接觸。由於他曾留學俄國近十二年，又與俄國女子芬娜（即蔣方良女士）結為連理。基於此種背景，蔣經國曾在一九四五年三度參與對俄交涉。一是六月二十七日偕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宋子文，為《雅爾達密約》事銜命赴俄；二是八月五日與行政院長宋子文、外交部長王世杰一同訪俄；三是十月間飛長春，參與戰後東北交涉。蔣經國的留俄背景，應能讓他在處理對俄外交方面一展長才。但一九四九年在大陸成立的中共政權開始一面倒向蘇聯，此後在東西兩個陣營的冷戰對抗態勢中，退居臺灣的中華民國成為以美國為首的民主國家中的一分子。於此情況下，中華民國與蘇聯並無外交關係，即使民間的往來也是絕無僅有。

一九五〇年以來，中華民國與美國的關係至為密切，而這段時期也是蔣經國培養政治經驗，進而成爲國家領導人的歷程。一九五〇年代和一九六〇年代，美國對中共採圍堵政策，中美兩國之利益相同。但此後他之出任要職，則與中美關係生變有關。一九七一年，尼克森（Richard Nixon）總統已經開始以「談判代替對抗」，尋求與中共的直接接觸，蔣氏在此時出任行政院長。一九七七年，中共與美國關係發展日趨密切，蔣經國當選為中華民國行憲第六

任總統，此後他不僅要在中美關係的最險惡時期力挽狂瀾，也要為斷交後的中美關係，開創新的局面。由於蔣氏辭世僅有十年，其晚年作為尙難採歷史研究方法，作一深入考察。本文僅就蔣氏來臺後至出任國家最高行政首長前，所參與的對美外交事務，試圖作一初步認識。

## 二、初訪美國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韓戰爆發，兩天之後，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下令第七艦隊進入臺灣海峽，一則防止中共入侵臺灣，另則要求臺灣停止出兵攻擊中國大陸，中華民國政府原則接受。次年美國恢復經濟援助中華民國，並於五月一日在臺設立軍事顧問團（Military Assistance Advisory Group, MAAG），此時處於風雨飄搖之中的臺灣軍民，安全感獲較多的保障。

繼杜魯門擔任美國總統的艾森豪（Dwight Eisenhower）於一九五三年一月就職後，對中華民國的支持更為積極。首先，艾森豪於二月一日在第一次致國會的咨文中，斷然解除臺灣的中立決定，但這並不意味著臺北政府可以放手反攻大陸，只是美國為了增強對中共的壓力，迫使中共早日解決韓戰問題，而不再干預臺北面對中共採取軍事行動。其次，四月三日美國大使藍欽（Karl L. Rankin）向蔣中正總統呈遞到任國書，中美兩國的邦交更趨穩定。雙方軍政官員也展開頻繁的互訪。就在是年九、十月間，時任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的蔣經

國，首度踏上了新大陸，進行爲期四十天的訪問。

蔣經國的初次訪美，就表面看來，只是應美國國防部和國務院邀請，考察美國軍事部門措施。（註三）但其背後意義卻不僅如此。這項邀訪，原是由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雷德福海軍上將（Admiral Arthur W. Radford）於是年六月訪臺時，向蔣中正總統提及美國對蔣經國在軍隊中推行政工制度的做法有些批評，因此建議蔣總統讓蔣經國訪美，「親眼目睹美國人如何生活、工作與處理政治和福利等各種問題」。（註四）而另一個原因，是國務院和國防部終於瞭解第三勢力不會成功，中國仍以蔣中正總統最具威望，然而蔣總統年近七十，精力日衰，其繼承人問題十分重要。蔣經國應是可能的繼承人選，但美國不知蔣氏本身態度如何？對美國的認識又有多少？故而由國務院和國防部共同邀請他訪美，「讓他看看美國，並觀察他有何反應——他是否欣賞和理解美國民主生活，以及是否願意應用於中國」。（註五）

蔣經國於九月十一日離開臺北，在日本東京停留一晚，次日經檀香山飛抵舊金山，後轉赴洛杉磯、芝加哥、底特律、堪薩斯城、紐約，於九月二十八日抵達首都華盛頓，二十九日晉見艾森豪總統。其後四日，除會晤當地僑界人士，又拜訪中央情報局局長艾倫·杜勒斯（Allen Dulles）、國務卿杜勒斯（John F. Dulles）、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雷德福、心理作戰部部長傑克遜。（註六）十月五日當天參觀北卡羅來納州布拉格堡，八日由駐美大使館安排拜訪前總統胡佛（Herbert Hoover）。此時駐美大使顧維鈞突然想到應安排蔣經國訪問前總統杜

魯門，蔣氏初時對此提議十分排斥，但後來仍於十月十五日再飛堪薩斯城（Kansas City）拜會了杜魯門。十月十九日蔣經國結束全部訪問行程，離美返國。

在一個多月的訪美行程中，蔣經國確實參觀了預先安排的若干軍事設施，包括海、陸軍基地、海軍官校、西點軍校。此外，艾森豪總統臨時建議參觀的本寧堡步兵學校、諾克斯堡裝甲兵學校、奧克拉荷馬州錫爾堡的野戰砲兵學校，也都分別造訪。美國方面安排這次的訪問行程，主要目的是希望過去曾在蘇聯生活過很長一段時間的蔣經國，有機會多瞭解美國的民主政治和生活方式。蔣經國曾多次提起這次訪問美國的印象。九月二十九日他在美國國防部長威爾遜（Charles E. Wilson）爲他舉辦的晚宴中，就陳述了他旅程中的兩個不尋常的印象，一是參觀胡佛大壩時，發現大壩對任何人都是開放的。另一是參觀萊文沃思監獄，注意到餐廳內有塊牌子寫道：「取飯菜不限量，但必須吃光，切勿浪費。」因此他的結論是：「這個國家有真正的自由，同時也是個富饒之邦。」（註七）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三日他在答覆臺北「美國之音」訪問時，更談到：

除了軍事範圍以外，美國所給我最深刻的印象，是政治上的民主作風、社會上的守法精神，以及人民生活上的自由和快樂。我參觀了這麼多地方以後，最使我感到興趣的，是許多設備完善的幼稚園，在這裡，我不但可以看到美國富強的今天，更可看到美國人民幸福的將來。

此外，他對美國國民創造力與拓荒精神的表現，以及美國婦女對社會的貢獻，也給予高度的肯定。（註八）在美期間，他原先無意拜訪前總統杜魯門，後來經顧維鈞敦勸，才勉強接受安排前往。然而訪問時，竟然看到杜魯門的公館和普通人家一樣，而杜魯門也是貌不驚人，穿著短褲，捲著袖子，提著水泥桶在修路。後來蔣經國對劉安祺敘述此事時，還說：「這些地方值得學。」（註九）這個印象，對蔣氏日後的平民作風應有一定的影響。

由於蔣經國是國軍政工系統主要負責人，因此他和美國類似單位的心理作戰部門人員的接觸，就更值得我們注意。他在十月二日上午接見一名負責心戰工作的格林上校，並允諾支持格林上校即將在臺灣設立的心戰機構。當日下午則拜訪心戰部部長傑克遜，交換心理作戰的看法。（註一〇）在兩人的談話中，蔣經國似未解釋本身負責之政治作戰性質，但對傑克遜介紹之美國心理作戰任務時，則提出了具體的建議。傑克遜所負責的部門，並沒有設立正式機構，也沒有工作人員，只雇用兩位女秘書處理日常業務。而其工作內容是美國之音以自由亞洲和自由歐洲的名義進行廣播；自他上任後，修訂了節目內容，美國之音只廣播具體事實或作真實報導，其他活動則暫停或縮減。傑克遜認為美國之音干預或評論鐵幕裡發生的某些事情是無用的，重要的是播放新聞和一些娛樂節目。他並向蔣經國詢問中國大陸收音機數目約為若干，並請他估計國外廣播的收聽率。（註一一）

蔣經國指出中國大陸收音機數目不會很多，而共產政權為了控制人民思想，嚴厲禁止人

民收聽國外廣播。對於美國之音的廣播內容，蔣氏表示自由世界的電臺應當播放亞洲及各國人民感興趣的節目，若只是描寫西方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貧困的亞洲人民是不能理解的，而且會為共黨統治者利用，進行反宣傳，使其人民憎恨外國壓迫和渴望完全獨立。他進而建議美國之音的節目應更切合實際，使亞洲各國人民瞭解共黨政權及共黨宣傳的奸詐和欺騙的危險性。在這方面，他所負責的機構樂於和傑克遜的駐臺代表就加強節目內容，作進一步的磋商。傑克遜十分贊賞蔣經國提出雙方機構緊密合作和改進節目內容的建議，他十分樂於就雙方未來之合作進行研究。（註一二）而在十月五日蔣氏訪問北卡羅來納州布拉格堡時，特別參觀了當地的心戰學校。（註一三）

他認為美軍的心理作戰也有可供借鏡之處。他認為：「美國軍隊裡的精神教育，是著重於國家、榮譽和責任三點。並且經常告訴官兵們：為何而戰？為誰而戰？……同時，美國軍隊裡非常注重軍中牧師的服務工作。」美國軍隊裡的教育方法和精神有不少可供參考，他希望「使國軍部隊裡的政工人員，都和美國軍隊裡的牧師一樣，成為『官兵之友』」，並「仿照美軍心理作戰的方法，積極展開工作，使國軍官兵們的反共決心，更加堅定，使敵人的鬥志，趨於瓦解」。另外，他也認為國軍官兵應效法美軍官兵，養成自動自發的精神。由於美國人並不瞭解中國軍隊裡的政工制度，蔣經國也就此再加解釋。他說：

美國和中國的軍隊，雖然因為歷史、環境和條件的不同，各有其不同的組織和方法

——例如：在美國軍隊裡提高士氣的工作，是在各參謀單位裡分別去做的，而中國軍隊這一方面的工作，則是集中在政治部做的。但是，精神教育的目的，是相同的，那就是：提高士氣，擊敗敵人。（註一四）

他繼續辯護說：中國軍隊中的政工人員，和俄國的政治委員並不相同，「俄國的政治委員，是監視部隊裡的行動的；而我們的政工人員則是盡力協助部隊長處理一些與士氣有關係的活動。他是部隊長的助手，協助辦理教育與新聞，並組織康樂隊、勞軍團，從事康樂工作」。至於國軍之中政治部的工作，「多與美軍中新聞教育以及特勤康樂活動相同」。他堅決維持國軍的政治制度，因為：

我們軍隊中的政治部，是共匪所害怕與憎恨的。共匪知道如果我們的政治部不滅除，他們便很難打這一場戰爭。而我們如果沒有這一個組織，我們的軍隊便將失去抵抗共匪思想威脅的力量。（註一五）

蔣氏返國後，中美之間應有若干政治作戰的合作。中國方面可能對美國之音亞洲部門的廣播節目製作，提供了若干協助。另自一九五四年起，美軍在華顧問團指派四名軍官擔任國防部總政戰部和臺灣保安司令部顧問。美國國防部希望阻止總政戰部干預美軍顧問團的訓練工作，但美方也坦承擔任總政戰部顧問的美軍軍官不易達成使命。此外，美方十分注意有關政戰部門干預國軍將領的指揮權，而這種干預應是奉蔣經國之命行事。故而可能基於美軍

顧問團的建議，蔣總統決定由中美雙方合組一委員會調查此事，美方相信此舉將能導正蔣氏父子的做法。（註一六）而蔣經國所推崇的美國軍中牧師制度，曾有計劃試行於國軍之中，但實際並未建立。（註一七）

### 三、嶄露頭角

蔣經國自美返國後，一九五四年九月五日調任為國防會議副秘書長。是年年底，在第一次臺海危機中，中美兩國簽訂了《共同防禦條約》，臺灣的安全因此有了深一層的保障。然而一九五五年年初，一江山的失守和緊接著的大陳撤退，使得美國十分關切臺灣的民心士氣。主管東亞事務的助理國務卿羅勃森（Walter Robertson）在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七日國務院的一次談話會議中，向紐西蘭大使門祿（Leslie Knor Munro）解釋他所獲得的兩份內容不同報告，一份指出臺灣人民有如釋重負的感覺，另外一份則指出由於情勢不利，蔣總統因逐漸喪失顏面而導致其屬下叛變，蔣經國可能也是背叛者之一。但羅勃森就其個人與蔣經國的接觸，對此臆測不表同意。三月十四日的另一場談話會中，杜勒斯國務卿也提到蔣經國可能是反美陰謀的領導人。但紀錄之中仍註明羅勃森和藍欽大使都不同意中央情報局對蔣經國會背棄自由世界的懷疑。四月十六日中央情報局局長呈報的〈臺灣士氣估計〉文件中，終於表達了不能相信蔣經國會有背叛舉動。（註一八）然而在一九五八年出任中央情報局駐臺辦事處主

任的克萊恩(Ray S. Cline)，其所負使命之一，即在蒐集相關情報，（註一九）「私底下送交美國政府，以便判斷蔣經國對蘇聯制度的真正感想」。可見美方在邀訪蔣經國之後，對他留學蘇聯達十二年的背景，仍然有些疑慮。

不過美國國務院最關心的仍是蔣經國會否成爲蔣中正總統的繼承人。一九五四年九月十四日中央情報局局長呈報的〈一九五六六年中以前臺灣情勢之可能發展〉文件中，指出副總統陳誠和蔣經國兩人權勢相當，而蔣總統似乎也刻意維持兩人均等的影響力。但預測在未來一年多以內，一旦總統之位出缺，依據憲法，陳誠會繼任總統，不過權力角逐會白熱化，蔣經國依然大權在握，且極可能取得最高權力。（註二〇）而在一九五六年蔣經國出任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兼代主任委員後，一九五七年春天，美國退伍軍人處(Veterans' Administration)曾邀請他再訪美國，但因臺北發生「五一四事件」，訪問因之延期。

（註二一）

「五一四事件」起因於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日美軍上士雷諾槍殺中國公民劉自然，而在五月二十三日的軍事審判結果，雷諾被判無罪，引發臺北民眾的反美暴動，並攻擊美國大使館。此一事件當時也將蔣經國牽連在內。（註二二）而他也在事件發生次日，眞除輔導會主任委員，並於六月一日正式接事，可能有意使其避開此一事件之影響。然而在八月二十七日美國國務院一份〈中華民國政府展望〉的文件中，仍視他爲陳誠的最大競爭對手，因他「與其

父關係密切，且掌握情治、軍隊政工、救國團、國民黨基層重要幹部」。（註二三）而在是年十月七日艾森豪總統特別助理瑞查斯(James P. Richards)致國務卿杜勒斯的備忘錄中，仍建議邀請蔣經國來美進修一年，因爲這將對蔣本人和臺灣的士氣都有好處。而退伍軍人處也同意重新邀請蔣氏在一九五八年二月訪美一個半月。（註二四）

然而一九五八年蔣經國並未出訪美國。是年夏天，臺灣海峽風雲再起，中共於八月下旬砲擊金門，空中與海上亦有國共的機艦進行慘烈戰鬥，直到十月間戰事稍歇，史稱「八二三砲戰」，又稱「第二次臺海危機」。危機解除後，美國中央情報局開始與中華民國政府進行一項重要的合作，即派遣中國空軍軍官，駕駛美製高性能 U2 高空偵察機，深入大陸地區進行偵測任務。由中華民國選派優秀空軍軍官赴美接受嚴格的訓練，返回國內後，加入桃園基地的空軍第三十五中隊（又稱黑貓中隊），駕駛 U2 飛機赴大陸進行高空偵測，偵測目標除一般軍事部署外，尤其注意中共正在發展中核子設施，同時也取得中共運用新型武器的寶貴情報，供美軍情報單位進行研判。

此一特種任務之進行，美國方面是由中央情報局駐臺代表克萊恩負責，中國方面則是蔣經國負責。其實早在一九五〇年代初期，美國透過西方公司和中華民國進行情報蒐集的合作計劃。此時蔣經國掌管情報活動，與美國早有協調聯繫。（註二五）由於相關史料尚未公開，我們無法清楚瞭解其組成情形和任務之執行，不過在一九六〇年代，蔣經國經常造訪桃園基

地慰勉執行任務的飛行員及其眷屬，甚至親赴跑道迎接歷險歸來的飛行員。從一九六一年到一九七二年，三十五中隊總共出動一百二十二次高空偵測大陸任務，其高空照相所得，有助於自由世界，尤其是美國，瞭解中國大陸的軍事設施建立情形。而黑貓中隊的二十七名隊員，亦有十名在訓練或執行任務時殉職。（註二六）

到了一九六二年，臺北方面開始準備對中國大陸發動攻擊，以完成反攻的神聖使命。此構想之形成，顯然受到當時大陸、美國，及臺灣本身情勢的影響。

大陸方面，一九五七年起中共假借「大鳴大放」運動，開始整肅右派，知識分子人人自危。經濟上，中共在一九五八年展開「大躍進」，以加速經濟發展，並自是年夏天開始推行「人民公社」。雖然中共宣稱農業和工業產值迅速成長，但事實證明「大躍進」完全失敗。緊接而來的「三年自然災害」，大陸同胞餓死超過三千萬人。一九六二年更有大批飢民湧入香港，引起世界震驚。而在大陸內部，不滿情緒必然節節升高；此時雖然尚未出現大規模的抗暴行動，但西藏地區之武裝衝突已有多年。對外關係方面，中、俄共發生齟齬，蘇俄開始撤出派駐中國大陸的技術人員。中共與印度之間的邊界糾紛，也在一九六二年演變成武裝衝突。

來自美國方面的影響，則為臺北方面對美國未來的政策走向感到疑懼。一九六〇年美國總統大選時，兩黨候選人曾辯論過金門、馬祖問題。當時民主黨籍的甘迺迪（John F.

Kennedy）參議員曾提出他若當選後，將會勸說臺北放棄金門、馬祖。（註二七）蔣中正總統對甘迺迪之言論極為不悅，立即聲明中華民國會誓死保衛金門、馬祖。（註二八）甘迺迪當選總統後，臺北方面十分擔心美國會改變對華政策。而在甘迺迪政府之內，確實也正在構思「兩個中國」的政策，此事令臺北感到不安。（註二九）

臺灣方面，年逾七十五的蔣中正總統期待反攻大陸已有十四年，在他内心應該漸有時不我予的感觸。當大陸似乎正處於內憂外患之中，抗暴行動一觸即發，應是裡應外合復仇雪恥的最佳時機。他在一九六一年年底呼籲修改《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俾不受美國約束而對中共發動攻擊。（註三〇）一九六二年三月十五日，他籲請甘迺迪總統同意，如果中國大陸發生大規模抗暴行動，國軍可以立即出兵。（註三一）而實際的反攻行動也在積極準備之中，國防部內成立了戰地政務委員會，負責收復地區的安頓。甚至連攻擊發起日都已決定。（註三二）

就在此刻，美國國務院主管遠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偕同情報部門主管希斯曼（Roger Hilsman）到菲律賓主持遠東地區美國使節會議。哈里曼打算在返美途中，來臺晉見蔣總統，故要希斯曼先來臺北預作安排，並與「蔣總統最可能的繼承人及臺北政府情治系統首腦」蔣經國商談。希斯曼於三月八日抵臺，立即晤蔣經國。

希斯曼印象中的蔣經國，是一個友善但具有威嚴，有時又有些拘謹的人。在評論他人時，蔣氏顯得精明且嚴厲。當日下午的會談中，蔣氏列舉多項理由，說明為何一九六二年為

反攻大陸的最佳時機，且中華民國政府蒐集到的情報，足以支持他的論點。希斯曼雖未轉述蔣經國的論點為何，但他對這項大膽的行動態度甚為保留。他指出中國大陸雖有部份人民不滿中共政權，且願拼死推翻暴政，但在一個嚴密控制的警察國家內，革命行動不易成功。他也懷疑當年威信喪失的國民黨政府離開大陸後，能否再獲得展開抗暴行動的大陸人民支持，而過去十三年來，蔣總統很難有機會讓大陸人民持續瞭解他。希斯曼認為臺灣方面應該蒐集更多可靠的情報，讓美國再作評估。如果情報顯示中共政權並非朝夕就會垮臺，那麼就由中華民國政府自行作出決定，而不是由美國迫使臺北暫停反攻大陸的計劃。回到菲律賓後，希斯曼將在臺北的討論結果向哈里曼報告，不久哈里曼親來臺北晉見蔣總統，哈里曼對此事的想法亦與希斯曼相同。然而臺北方面仍未放棄此一意圖。（註二二二）

中共察覺到臺灣方面的意圖，也開始增兵福建地區，並加強對金門、馬祖的砲擊。五月底中共總理周恩來指示其駐波蘭大使王炳南，要他確定美國對此事的態度。六月二十三日，王炳南與美國駐波蘭大使卡伯特（John M. Cabot）在華沙會面。王炳南向卡伯特提出警告：如果臺海危機再起，中共將不顧一切「解放」臺灣。六月二十五日美國國務院指示卡伯特答覆王炳南：美國將不會同意蔣總統的反攻大陸計畫。（註二四）六月二十七日甘迺迪總統在一场記者會中警告中共不可對臺灣動武，並重申美國協防臺、澎、金、馬的決心，同時說明美國反對臺海兩岸訴諸武力。（註二五）當然，美國對此事的態度極為謹慎，亦是擔心重蹈一年

多以前古巴「豬玀灣事件」（Bay of Pigs）覆轍，故未有絕對把握，不會准許臺北的全面軍事行動。

一九六三年，美國中央情報局和國防部提議邀請蔣經國訪美，蔣氏遂於是年九月六日以行政院政務委員身分第二度訪問美國。此次訪問歷時僅十一天，主要與國務院高級官員會談。蔣氏雖於九月十三日在華府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中指出「消滅中共政權現為最佳時機」，（註二六）但當時與甘迺迪政府官員會談內容，迄今尚未發表。據希斯曼之觀察，蔣氏返臺後，各種報導顯示臺北逐漸強調中共暴政滅亡不遠，而最佳策略是耐心等待。其他亞洲國家人士則認為中華民國已放棄原先之計畫，自大陸各地抽調而來部署東南沿海防備國軍進襲的重兵，也逐漸撤離。（註二七）

#### 四、面對變局

一度訪美後不到一年，蔣經國的職務又有新的調整，於一九六四年三月十二日改任行政院政務委員兼國防部副部長。一九六五年一月十三日繼俞大維任國防部部長。此時越戰日漸昇高，美國總統詹森（Lyndon B. Johnson）投入大批美軍於越南戰場。臺灣雖未派兵援越，卻也對越南提供了經濟和技術援助。更因臺灣所處之地理位置，以及中美兩國訂有盟約，遂使臺灣成為美軍軍品維修補給和官兵渡假的重要據點，故在越戰期間，中美兩國軍事關係益

形重要。而就在蔣氏升任國防部長不久，美國國防部長麥納瑪拉 (Robert McNamara) 計劃邀請蔣氏再訪美國，是年九月十九日蔣經國展開了他第三度的訪美之行。

這次訪美為期兩週，蔣氏除謁見詹森總統，拜會艾森豪前總統，另與國務卿魯斯克 (Dean Rusk) 和國防部長麥納瑪拉交換意見，及參觀休士頓太空中心、戰略空軍司令部、洲際飛彈基地等重要設施。（註三八）在與詹森總統和國務卿、國防部長晤談之中，必然討論到應否由中華民國軍援越南之事。蔣氏在抵美當天曾表示：「中華民國派遣軍隊前往越南，可能不是我們協助解決越南問題所能努力的最佳途徑，我們協助解決此項問題，尚有他途可循。」而在九月二十二日蔣氏與麥納瑪拉發表的聯合聲明中，更確定了中華民國對於越南只是增加更多的經濟援助。除了這項議題之外，兩位國防部長也討論了是年年底美國經濟援華停止後的軍事援助。（註三九）此外，在蔣赴美前不久，曾任中華民國代總統的李宗仁自美返回中國大陸，由於李宗仁在北京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中，指控曾有部份美國人於一九五五年促請他領導一項推翻中華民國政府的政變，蔣氏於拜訪艾森豪前總統後，獲得授權否認此項指控。（註四〇）蔣氏此舉，應是為了避免李宗仁的談話，引發部份臺灣人士的猜疑，而影響到當時的中美關係。

艾森豪總統原是支持中華民國反共的堅強盟友，故在一九六九年艾森豪逝世後，蔣經國於三月三十日奉派以特使身分參加喪禮。此為蔣氏第四次赴美，停留不到一週，於四月三日

返國。這次訪問行程雖然匆促，蔣氏仍會晤了新當選的美國總統尼克森，並與國務卿羅吉斯 (William P. Rogers)、國防部長賴德 (Melvin Laird)、參謀首長聯合會議主席惠勒 (Earle Wheeler) 交換意見。（註四一）然在此時，尼克森正在開始籌思美國對東亞的新政策，無可避免對中華民國造成一連串的衝擊。

尼克森在當選美國總統不久，就開始尋找機會與中共接觸。一九六九年三月上旬，中蘇共軍隊在珍寶島發生武裝衝突，更增強了尼克森與其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 (Henry A. Kissinger) 聯中共以制蘇俄的決心。（註四二）加以美國多年以來陷入越戰泥淖，急欲抽身，亦需要借助中共力量迫使北越結束戰爭。七月二十五日尼克森在關島演講，揭示美國今後外交政策的原則，是要求亞洲盟邦為自己安全多分擔些責任。其後幾個月，尼克森更在多種場合發表演說，明確指出美國不願再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只願與盟邦、友邦「守望相助」，形成了所謂的「尼克森主義」 (Nixon Doctrine)。

由於尼克森政府的外交政策有所轉變，勢必引起亞洲盟國不安，是年八月，國務卿羅吉斯訪問亞洲，向友邦闡述美國的亞洲政策及重申對友邦的承諾。八月一日至三日停留臺北期間，羅吉斯強調美國遵守對中華民國的條約承諾，並面邀擔任行政院副院長的蔣經國於次年春天訪問美國。然而在這種安撫動作之外，尼克森總統繼續尋求與中共關係的進一步改善。是年九月，他在聯合國大會中公開表示願與中共領袖談判，繼而於十月決定取消兩艘軍艦永

久巡弋臺灣海峽的行動，改由其他軍艦每月通過臺海十五次。（註四三）一九七〇年一月，來華訪問的美國副總統安格紐（Spiro Agnew），應該也負有對華解釋尼克森政策轉變的任務。

一九七〇年蔣經國第五度訪美，主要想知道美國在改變其對亞洲政策的時刻，是否信守中華民國的承諾，包括：一、美國政府在與中共舉行華沙雙邊會談中，打算作何種讓步？二、美國是否繼續支持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三、如果中共再次攻擊金門、馬祖，美國能提供多少援助？其他希望美國表明態度的問題則有：對美國臺獨份子頻繁的活動、大陸文革權力鬥爭下的情勢、以及為保衛臺灣所需求更新的軍事裝備。（註四四）美國則有媒體視蔣氏這次訪問，為對美國政策改變的抗議。（註四五）

這次訪美行程歷時兩週，而美國原計劃此時與中共舉行的華沙會談，也因蔣經國的到訪而延期。（註四六）蔣氏抵美後，除了一再向僑胞宣示，中華民國政府雖然面對世界局勢之變化，仍然堅定其反攻大陸之決心，（註四七）另與國務院、國防部等高級官員晤談，並於四月二十一日晉見尼克森總統，接受其晚宴款待。由於這段期間中美關係生變，美國大眾傳播界比較重視中國大陸事務，對蔣氏之來訪反應冷淡。不料四月二十四日蔣氏在紐約遭人開槍行刺未逞，而使其訪美行程開始受到傳播媒體的重視。（註四八）

從目前有限的資料，我們大致瞭解蔣氏曾與尼克森總統有過如下之磋商：

(一) 中華民國的蔣總統支持美國的新亞洲政策，但臺灣仍為亞洲問題的中心。中華民國光

復大陸的目標與「尼克森主義」不相衝突，美國總統無須派兵支援，然中華民國需要美國的物資與精神支援。

(二) 蔣氏建議由中華民國、南越、南韓與泰國組成防衛體系對抗共黨侵略，但需由美國支持與領導。尼克森對此未作承諾。

(三) 尼克森向蔣氏表示剛恢復的華沙會談屬於試探性質，不會影響中美友誼，並保證美國永遠信守條約義務，不會出賣臺灣。

(四) 尼克森詢問蔣氏對於中、蘇共會否在短期間內修好的看法，蔣氏的答覆是否定的。（註四九）

而在停留華府期間，蔣氏亦提出由美國領導召開一項亞洲自由國家參與的會議，討論如何制止共黨侵略柬埔寨的問題，但美國顯然無意於此。（註五〇）

四月二十八日蔣經國發表離美聲明，表示在美期間與美國總統和有關政府部門官員的交換意見，「增進了彼此的互相了解，深信此了解的增進，對貴我兩國均屬多有裨益」。從以後的中美關係發展看來，當時所謂的「了解」，恐怕已隱含了中華民國政府必須對未來一波又一波的衝擊，有所準備。

## 五、結語

一九四九年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前後，中美兩國外交關係陷於低潮。後因國際局勢轉變，兩國關係方獲改善。一九五〇年代到一九六〇年的冷戰前期，在遏阻共黨勢力擴張的前提下，中華民國之與中共對抗，自然符合了美國的圍堵政策。雖然蔣中正總統之無時無刻不想反攻大陸，並不一定合於美國的利益，但在臺灣亟須依賴美國援助的情況下，臺海問題倒也不容易將冷戰升高成熱戰。

中華民國固然需要美國支持，以對抗中共，而就美國本身利益考量，在冷戰對抗的態勢中，臺灣也必須能維持一個忠實盟友的地位。由於蔣中正總統年事已高，未來臺灣的領導人能否符合美國的期望，自然引起美國的關切。早在一九五〇年代美國就預期蔣經國有可能脫穎而出，成為蔣中正總統的接班人。然而蔣經國長期的蘇聯經驗，卻毫無美國淵源，令美國政府有些不安，因此透過邀請蔣氏來美訪問，俾對其有所啓發。然而蔣氏五度訪問美國，總計停留不超過三個月，對於美國或有些許認識，其個性與處理事務的風格，恐怕不易有太大的改變。但是蔣經國確實理解美國對他蘇聯經驗的疑懼。他之向克萊恩展示其留蘇時期的日記，顯然是要美國相信他並不接受蘇聯經驗，自然就不會背離民主國家陣營。到了一九六〇年代，蔣經國承繼大業的態勢愈益明顯，而在中華民國的官僚體系內，具有留美經驗的人越來越多，美國實際上已不再擔心蔣經國的態度。

蔣經國受到美國的重視，固然與當時美國考慮本身的利益有關。但是蔣氏的身分和地

位，在冷戰前期中美兩國關係的發展上，亦有其重要意義。他之五次訪問美國，多則四十天，少者僅五日，除了宣慰僑胞外，必定都有甚多的議題涉及中華民國本身的利益。如中美軍事合作、美國對臺北反攻大陸做法的態度、越戰時期中華民國的角色等，蔣經國均曾受命與美國政府官員進行交涉。限於相關史料取得不易，故而本文旨在拋磚引玉，藉若干問題的提出，深盼學界做進一步的探討。

一九七〇年的蔣經國，已是美國認定的未來中華民國領袖，但因尼克森政府開始改變冷戰時期的亞洲政策，尋求和中共的和解，使得中華民國的外交陷於危機。蔣氏的第五度訪美經過，必然是研究中美關係史更重要的課題。一九七一年十月中華民國在不利的國際環境中，被迫退出聯合國；一個月後，美國與中共發表聯合聲明，宣布尼克森將於一九七二年二月訪問中國大陸。雖然尼克森在行前仍強調維持中美外交關係，並信守防衛承諾，但在二月二十八日的「上海公報」中，美國與中共已展開了「關係正常化」的第一步工作。蔣經國則於是年六月一日特任行政院院長，開始承擔更為艱鉅的使命。

#### 註釋

- 一·宇佐美滋著，王兆微譯：《美國對中國政府決策人訪問記——訪安克志》，《美國月刊》，卷一期六（一九八六年十月），頁七〇—七二。
- 二·沈劍虹：《使美八年紀要——沈劍虹回憶錄》（臺北：聯經出版公司，一九八二年三

版），頁二一一。另一種說法是安克志大使見到宋楚瑜後，先請宋安排能否在次晨面見蔣總統，宋則問能否立刻見面，安克志同意，遂於夜間一同驅車前往。見夏珍：《政海沉沉楚天闊——宋楚瑜二十三年政壇紀實》（臺北：商業周刊出版公司，一九九七），頁六三。

註 三：《中央日報》，民國四十二年九月十一日，頁一。有關蔣經國首次訪美行程，詳見〔一〕《顧維鈞回憶錄》，第十分冊（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九），頁三七二—四四〇；〔二〕沈鈞：〈隨經國先生訪美記〉，刊於《傳記文學》，卷六五期六、卷六六期一至期四（一九九四年十二月至一九九五年四月）。

註 四：《顧維鈞回憶錄》，第十分冊，頁四五七。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以下簡稱FRUS），1952-1954 Vol. 14, China and Japan, Pt. 1(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5), p. 207.

註 五：《顧維鈞回憶錄》，第十分冊，頁三八四、三九〇、四一〇一。

註 六：沈鈞所記傑克遜之職銜為艾森豪總統特別助理。

註 七：《顧維鈞回憶錄》，第十分冊，頁四〇一。

註 八：蔣經國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編：〈談訪美觀感〉，《蔣經國先生全集》（臺北：行政院新聞局，一九九一），第十三冊，頁一八七。

註 九：張玉法、陳存恭訪問，黃銘明紀錄：《劉安祺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一九九一），頁一九四。蔣經國另外提到的兩個心得，一是大家都有汽車，另一是處處都要小費。然而據沈鈞之記載，十月十五日蔣經國一行人是在堪薩斯城內聯邦儲備銀行的一間辦公室內會晤杜魯門，且所談只是客套話。見沈

鈞：〈隨經國先生訪美記〉，《傳記文學》，卷六六期四（一九九五年四月），頁七七。  
註一〇：見沈鈞：〈隨經國先生訪美記〉，《傳記文學》，卷六六期三（一九九五年三月），頁六一。

註一一：《顧維鈞回憶錄》，第十分冊，頁四一三—四一四。

註一二：《顧維鈞回憶錄》，第十分冊，頁四一四—四一五。

註一三：見沈鈞：〈隨經國先生訪美記〉，《傳記文學》，卷六六期三（一九九五年三月），頁六三。

註一四：〈談訪美觀感〉，《蔣經國先生全集》，第十三冊，頁一八六。

註一五：〈只有反攻一條路——民國四十四年十月二十九日答美國記者羅勃·馬丁問〉，《蔣經國先生全集》，第十三冊，頁一八〇—一八一。

註一六：FRUS, 1952-1954, Vol. 14, p. 365。

註一七・周聯華・《周聯華回憶錄》（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一九九四），頁11111-11117。

註一八・FRUS, 1952-1954, Vol. 14, pp. 288, 369, 485。

註一九・克萊恩著，聯合報國際新聞中心譯・《我所知道的蔣經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一九九一年四刷），頁七一。

註一〇・FRUS, 1952-1954, Vol. 14, pp. 633, 643.

註一一・FRUS, 1955-1957, Vol. 3, p. 629.

註一一一・江南・《蔣經國傳》（臺北・李敖出版社，一九九五），頁11111-11117。江南指出，五月二十四日下午成功中學學生約五十人到美國大使館院內示威，「為暴民助陣」，而成功中學校長潘振球是蔣經國高足，故而認為潘係得到上級指示，派學生參加示威。筆者在一九九八年一月八日於「紀念蔣經國先生逝世十週年學術研討會」中宣讀本篇論文時，特就此事請教國史館潘振球館長。潘館長指出，他早於事件發生兩年以前調至省訓團服務。五月二十四日當天，蔣經國在省訓團連續接獲李煥、胡軌報告，潘氏感覺事態嚴重，提出要重視此事，否則可能演變成另一個「沈崇案」。蔣經國則說：「何止沈崇案。」立即要潘氏等人四處聯繫，勸阻學生行動。六月下旬美國曾派人來臺瞭解蔣經國與此事件之關係，據趙聚鈺在其日記中所

載，他曾以蔣經國主委之作事做人，及其中國古道德熱腸，至公、至忠、至義，相告來華瞭解「五一四事件」之美國人士。見魏秀梅・《趙聚鈺先生年譜》（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一九九〇），頁九三一。

註一一二・FRUS, 1955-1957, Vol. 3, pp. 589, 591。

註一一三・FRUS, 1955-1957, Vol. 3, pp. 628-629。

註一一四・翁仁生・《CIA 在臺活動秘辛—西方公司的故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一九九二年初版四刷），頁一七五。

註一一五・翁仁生・Chris Pocock 合著・《黑貓中隊—U2 高空偵察機的故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一九九三年初版七刷）。克萊恩著，聯合報國際新聞中心譯・《我所知道的蔣經國》，頁11151-1117。

註一一六・有關中國空軍參與 U2 高空偵測之事，見翁仁生・Chris Pocock 合著・《黑貓中隊—U2 高空偵察機的故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一九九三年初版七刷）。克萊恩著，聯合報國際新聞中心譯・《我所知道的蔣經國》，頁11151-1117。

註一一七・Theodore C. Sorensen, Kennedy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65), p. 204.

註一一八・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5, 1960, p. 13.

註一一九・Roger Hilsman, To Move A Nation : The Politics of Foreign Policy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John F. Kennedy (New York : Doubleday & Company Inc, 1967), pp. 303-304.

註二〇・蔣中正・〈貫徹本黨的時代使命和革命任務〉，《先總統蔣公全集》（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一九八四），第三册，頁二六九八。

註二一・*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16, 1962, p. 14.

註二二・張力訪問、紀錄・《黎玉璽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一九九一），頁二一九。

註二三・Roger Hilsman, *To Move A Nation*, pp. 312-314.

註二四・王炳南・《中美會談九年回顧》（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八五），頁八七一八九。John Moors Cabot, *First Line of Defence* (Georgetown University, School of Foreign Service, n.d.), p. 128.

註二五・*The New York Times*, June 28, 1962, p. 12.

註二六・《蔣經國先生全集》，記事年表上輯，頁二四七。

註二七・Roger Hilsman, *To Move A Nation*, pp. 319-320.

註二八・〈第十二次訪美觀感〉，《蔣經國先生全集》，第十册，頁一〇六。

註二九・〈對付我們的共同敵人達到我們的共同目標〉，《蔣經國先生全集》，第七册，頁二七一。

註三〇・〈我們必須光復大陸〉，《蔣經國先生全集》，第七册，頁二八七—二八八；〈我

對反攻大陸等問題的看法〉，《蔣經國先生全集》，第十二册，頁二〇四—二〇五。

註三一・《從專員到總統》（臺北・遠澄出版社，一九九〇），頁二二〇。

註三二・陳志奇・《美國對華政策三十年》（臺北・中華日報社，一九八〇），頁二八〇—二八一。

註三三・陳志奇・《美國對華政策三十年》，頁二八二—二八七。

註三四・沈劍虹・《使美八年紀要》，頁四四一四五。

註四五・"U.S. and Taiwan : New Issues for Old Allies," *U.S. News & World Report*, May 4, 1970, p.52.

註五六・Henry 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 (Boston : Brown and Company, 1979), p.692.

註五七・〈我們一定要回大陸〉，《蔣經國先生全集》，第十册，頁二〇六。

註五八・陳志奇・《美國對華政策三十年》，頁二九四。

註五九・沈劍虹・《使美八年紀要》，頁四六一四五。

註六〇・"U.S. and Taiwan: New Issues for Old Allies," p.52.

喬寶泰：蔣經國先生與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工作

鄭梓：追尋民國六〇年代「蔣經國先生的政治改革」

朱重聖：國史館現藏《蔣經國總統檔案》介紹

——以新聞報導下「用人政策」為主軸的思考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八月出版

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 第二十輯

定價：精裝新臺幣四〇〇元

編印者：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

發行者：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

地址：臺北縣新店市北宜路二段四〇六號  
電話：二二一七五五〇〇—六〇五

郵撥帳號：一五一九五二一三號

承印者：協聯印書館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貴陽街二段二三二巷四號  
電話：(02)23319172

ISBN 957-99671-5-6 (精裝) : NT\$400